

文化資本研究

——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

陈锋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文化資本研究

——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

陈锋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文化产业是世界经济的新亮点,文化竞争是世界竞争的新领域。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再生产是发达国家最核心的社会问题。在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步迈向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文化建设以及相关社会发展课题纷纷凸现出来。

本著借鉴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就,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对“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尝试建构了一个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从而为聚焦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如何观察、分析和开展文化建设、文化再生产,具有理论启迪和实践导引作用。

本著分九章依次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前沿、文化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文化资本内涵、文化资本的自身运行、文化资本与其他现代形式资本的转换、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本与文化制度和文化战略的确立和完善、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转型进行了理论论述。

阅读本著,可以对文化、资本、社会现代化等耳熟能详的概念获得全新的理解,从而对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机理、文化制度与文化政策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历史底蕴、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型变,产生豁然开朗的新认识。

本著适宜的读者对象为文化产业、文化研究、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的相关人员,关心文化发展的研究人员和大学师生,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资本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陈锋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2(2017.9重印)
ISBN 978 - 7 - 5605 - 9211 - 4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文化经济学-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1201 号

书 名 文化资本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
著 者 陈 锋
责任编辑 魏照民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1000 mm 1/16 印张 33 字数 81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5 - 9211 - 4
定 价 16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133

读者信箱:xjtu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

源于中外学者的研究和学术的发展,着眼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趋势,本著以“文化资本”为范式,建构现代文化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文化资本范式的出现和运用进行白描,以使文化资本理论成熟过程自然显现。“文化资本”学术用语初现时间是20世纪中后期,到布迪厄完整提出,恰与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复苏和第二波现代化兴起时期吻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新科技的勃兴,“新阶级”的崛起,确立了文化资本理论的社会支撑,并且使得文化权力、学历社会、人力资本、知识产业等一些社会现象,如有的学者所说,促进了马克思社会经济理论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和转变,以至于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有了关于文化经济的专著。布迪厄去世后,人们回过头来梳理文化资本理论,扩大了它的实用意义,在中国便适合了文化产业的兴起。而联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社会理论对文化产业的分析,建构文化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术逻辑的自然延展,也是现代化社会的实际需要。大众文化、现代传媒、知识生产、符号经济学,等等,系有史以来文化经济现象和文化政治现象的集中反映,也使得以往文化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实证主义等学术思潮对于文化以及现代社会文化生产(文化再制)的观察与研究进一步深入,文化政治经济学学术框架的建构似可见山见水。

第二章集中论及马克思主义相关文化的基本原理,以求文化资本理论能够与之接续对话。马克思主义创建实践基础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劳动创造历史的观点和劳动价值论,并由于“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②,将之在思想文化领域贯彻到底。在进入资本主义以来的现代化社会中,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认为,劳动积累形成社会生产不断扩大、财富不断增长的资本,劳动形式的分化形成不同形式的资本,构成了社会总体生产的介质。文化资本及其形成的社会“区分”,符合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和布迪厄的理论推演。文化资本者,大体即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中产阶级”,因为载负高新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理

^①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0.

念,在某种意义上,常常造就出和发动起最活跃的“反叛者”和“革命者”^①,进而成为古纳德所谓的“社会的领导阶级”^②。而随着物质生产对于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按美的规律来建造”^③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来,尽管后者不能超越物的依赖性机制,但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创造了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来分析,文化产业的运作,除了经济资本以外,文化资本的投入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进一步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以至于文化(包括文化制度、文化模式)的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不断丰富,按照卡西尔的说法,“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④

第三章在较为广泛长远的学术视野和历史维度上对文化以及文化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以揭示文化资本范式之“文化”的内涵。文化在广义上系人之为人的一切集成,在狭义上即精神及其活动和产物。在这两个极端上,关于文化成分、功能、意义的认识,形成了难以尽数的学派和思潮。总的看来,国际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触及文化内涵的精髓,“文化存在于各种外显的和内蕴的模式当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的制造物品的具体样式、由传统(或有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组成的文化基本核心,其中尤以价值为最重要。”^⑤在现代社会,可以简约地认为,文化包括技术、科学、观念等几种日常成分,它们对于人及社会拥有不同功能,文化资本之所以能够确立为一个理论范式,概由此生。从总的的趋势上看,“文化”取向真善美,因此“文化资本”可谓社会发展正能量。其代表的文化资源,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符合马克思所说:“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⑥

第四章对文化资本范畴进行了论说,谈及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资本的形态和特征。在现实之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不仅直接转化为金钱的商品交换为经济行为,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等非经济行为同样也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对于后者的发现,就是布迪厄的重要思想贡献。布迪厄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⑦,他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同样把实践作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在更为宽泛的劳动力类型基础上,强调了资本是劳动积累的观点,提出了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现代资本形式,并指出它们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换,最终都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后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直接把文化资本引入经济学,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财富形式,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文化价值。按照布迪厄区分,文化资本具有三种形态,即具身化、客观化、制度化。其中,具身化文化资本是最基本的,其主体接近于人力资本。客观化文化资

①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39-343.

② [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M].杜维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序言1-7,正文5-9,90-10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

④ [德]恩格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231.

⑤ 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3卷)[M].纽约: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1972:528.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0.

⑦ 高宣扬.布尔迪厄[M].台北:生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9.

本,往往联系着文化产业生产和流通的文化商品。制度化文化资本,彰显了文化资本的体制确认,例如文凭对学历的表征,“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①。

第五章演绎了文化资本经历生成、积累、流传、再生产等环节的运行过程。在现代社会,那些“精神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都是广义的文化资本,只是在狭义上文化资本更接近于新制度主义把知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称为的“资本存货”,文化资本经由文化要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成,并主要在现代教育体制中积累。由于文化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意味着时间的耗费和为了社会再生产而在一定时间内劳动的付出,而“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生存。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②,文化资本就可以时间计量。文化资本在不同地域内通过主体转换,形成文化传播现象,在内容上是文化,在属性上是资本,加上网络等新传媒的助动,文化的权力逻辑利于强势主体,造成了强势主体的文化资本在全球的特殊利益,形成了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造成了文化交往偏心(decentred)现象,需要交往参与者一同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传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扭转这种“不对称”状况。故而,对于后发现代国家来说,为了增强文化资本实力,需要调适民族习性,建设学习型社会,甚至进行文化移入,在清理批判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以有效整合以改进民族国家文化资本结构和性质。

第六章描述了文化资本三种形态之间以及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形成的等价交换。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各形式之间的内部转换往往以行为主体的文化行为为轴心,各资本形式之间形成的外部转换往往以社会劳动机制为基础。在市场机制运行中,主体的劳动不仅带有具体性,而且显现出社会性,从而使得资本之间的转换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转换中,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则以增强经济收益来表现,例如企业文化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马克思主义对于人力资本的最早认识,可见于对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分^③。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的概念,从个人主义的形式来看,即使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不完全相同,二者也是非常相近的^④。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关系最密切、形式最接近,甚至可以认为具身化文化资本就是人力资本。但是,西方学者指出,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提出了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对权威的诉求,而这种权威不能来源于其技能的经济用途,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颠覆力量^⑤。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地位在上升,有取代经济资本主导地位的趋势,文化资本对于资本阶级的社会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人力资本则不然。进而可知,文化资本具有社会生产关系属性,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确立起来。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与实体资本相区别的象征资本,代表着一种符号权力。

① [美]保罗·福塞尔.格调[M].梁丽珍,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20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3-234.

④ Derek Robbins.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Recognizing Society [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154.

⑤ Bill Martin, Ivan Szelenyi. Beyond cultural capital: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domination [M]//Ron Eyerman, Lennart G. Svensson, Thomas Soderqvist.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modern socie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16-49.

第七章论述文化资本理论实践化之一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场域的文化资本运行,遵从文化和经济两种逻辑,这是学术界和现象界在回答“什么是文化”时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CCD)的报告就把文化看成一种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所进行的所有活动^①。文化产业基本原理在于,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可以转向或增加经济价值,因此它依然遵从劳动价值论。文化产业在形态上包括文化资本品生产与交换产业和文化附加值产业两种形态。尽管后者可归于一般产业,但共同具有的特性有:文化商品有与生俱来的知识产权;内在意义价值的潜隐性;意义世界魅力的永久性。关于文化产业,更为特殊之处还在于,独一无二的文化商品的生产,只有个别劳动时间,而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的价值和价值量只能以体现在个别劳动中的精神世界的发现与创造所达到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高度为依据,由凝结在文化资本中的创造性劳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程度来决定;而且其交换价值的实现深受社会心理以及购买者个人心理的影响,因此,文化产业的绩效标准在于遵循文化资本的运行自律,关于文化产业的考量任何时候不能弃置文化价值而不顾^②。在社会功能上,文化产业因为文化属性的决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又属于现代化过程的高新层级产业形态,故而发展文化产业属于民族国家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发展文化产业又需要一定客观条件,包括文化资本的开发利用及知识产权保障,既懂文化又懂经营的职业群体,必备的技术和资金扶助,特别是有效监控的市场机制。

第八章由体制化文化资本论及文化资本体制化及文化制度。体制化是文化资本由具体到社会的过程,体现了制度等社会结构对社会成员文化禀性、性情习性的规导和文化资本的整合以及吸纳文化资本对制度本身完善,其中包含着有关文化的资源、权力的认证和强化,是文化权力的彰显,故而必然涉及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建设。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建设也是对于文化资本管理利用的有效途径。至于具体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与文化资本性质、状况相适应,着眼文化效益最大化,尊重文化自律而控制适度,采取积极的文化改造,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模式,争取文化崛起。文化关乎世界意义,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③,“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④。意识形态这种文化制度,由体制化文化资本建构,或者由文化资本不断体制化支撑的,实质也是一种制度化文化资本。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呈现新特点,理论化、媒体化、产业化、文化化越来越突出,因此要面向现代化,与文化战略相契合建设意识形态。如何调遣文化资本,规划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在现代治理中权重不断加码,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精心设计、稳健推行。面对多样化文化资本,必须解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统与创新及其有机整合这个总的题目,发展先进文化,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和谐。

第九章论说作为文化资本载体的文化人。“文化人”在不同的文化模式和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有不同的称谓,例如,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现代化社会的“知识人”,知识分子则往往用来涵盖其他称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那时有了专事脑力劳动的精神生产,成为社会文化知识的专门生产者、传播者、负载者。西方学者认为,知

① [澳]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 [J]. 潘飞,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4): 58-63.

② 大卫·索罗斯比. 文化经济学[M]. 张维伦,译. 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03:170.

③ [英]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7.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210.

识分子原型出现在文明轴心时代,到了近代理性时代得以完型,在现代化阶段涌现出专家型知识人,是西方社会的立法者和阐释者。马克思主义用阶级分析对待知识分子,把进步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前驱、理论的旗手、群众的先生。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文化资本者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构成正在崛起的古德纳所称的新阶级和佛罗里达所称的新阶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称为“士”,士志于道,主导着道统,与皇权政统相制衡,为中国文化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了历史贡献。与西方体制外抗衡政权的独立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则往往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富有家国情怀。在深入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扬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革命时期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肩负起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是中国当代文化人的民族大义和时代担当。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资本”知识现象学	
一、“文化资本”走入学术视野	(1)
二、文化资本研究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建构.....	(14)
三、文化资本研究的学术渊源.....	(25)
四、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文化思想要论.....	(36)
第二章 从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说	
一、生产劳动与唯物史观.....	(55)
二、现代社会与资本关系.....	(62)
三、社会分化与资本分化.....	(68)
四、文化资本与中间阶层.....	(77)
五、现代需要与文化产业.....	(90)
六、文化模式与文化制度.....	(99)
第三章 文化历史与理论	
一、“文化”界说	(109)
二、文化属性	(122)
三、文化功能	(131)
四、文化资源	(148)
第四章 文化资本范畴	
一、“文化资本”的提出	(165)
二、文化资本的形态	(181)
三、文化资本的特点	(199)
四、文化资本的功能	(210)
第五章 文化资本的运行	
一、文化资本的生成	(221)
二、文化资本的积累	(238)
三、文化资本的流动	(249)
四、文化资本再生产	(261)

第六章 文化资本的转换	
一、文化资本转换的表象和内因	(278)
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	(291)
三、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	(303)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317)
第七章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	
一、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本商品	(333)
二、现代性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	(346)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社会功能	(361)
四、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机制	(375)
第八章 文化资本与文化制度	
一、文化资本体制化	(389)
二、文化资本与文化政策	(402)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崛起	(413)
四、文化资本与意识形态	(427)
第九章 文化资本与文化人	
一、西方知识分子	(447)
二、中国古代卫道士	(468)
三、现代社会知识人	(481)
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实践空间	(493)
后记	(513)

第一章 “文化资本”知识现象学

一、“文化资本”走入学术视野

(一) 源起

“文化资本”范畴的提出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1986年2月，布迪厄在约翰·G. 理查森(John G. Richardson)主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上刊登出《资本的形式》一文，概述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基本类型、各自特点、转换方式以及文化资本的分类。布迪厄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或以物化的或以“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态呈现，而当这种劳动排他性地被行动者(个体或者其集合)占有时，那些行动者就能够以具体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经济资本，可以当下直接转换成金钱，转换过程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第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转换过程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第三，社会资本，以社会义务(“联系”)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转换过程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制度化。

布迪厄把文化资本分成了三种存在形态：一是具体的形态，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二是客观化的形态，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它们是理论的实现或客观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三是体制的形态，即以社会体制或社会权威认可的、客观化的形式存在，如教育资质颁布证书，使得文化资本呈现为公认的“财富”^①。

布迪厄的《资本的形式》首次对文化资本理论作了集中表述。在此之前，他使用“文化资本”概念却已不下20年之久。英国专家德里克·罗宾斯(Derek Robbins)将之追溯到1964年，布迪厄与法国学者J.-C. 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为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合作撰写了题为《大学生及其学习》的研究报告^②。1970年，布氏著述《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文化资本”一词赫然可见其间^③。1973年，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中，把“在社会上被认为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文化商品储备称为文化资本^④。1975年，通过对阿尔及利亚、法国社会以及对科学场域和学术机构的调查分析，布氏发现主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持有的科学知识及其在科学中所占据的地位密不可分。1977年，他在卡拉贝尔(J. Karabel)等主编的《教育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刊载的《文化权力》一文提出，正如有羽毛的动物比

^①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M] //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A. Stuart Well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6—58; 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6.

^② [英] D. 罗宾斯. 布迪厄“文化资本”观念的本源、早期发展与现状 [J]. 李中泽, 译. 国外社会科学, 2006(3): 38—44.

^③ [法] P. 布尔迪约, J. C. 帕斯隆. 再生产 [M]. 邢克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1.

^④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M] // Richard Brow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3: 71—112.

有皮毛的动物有更多的机会拥有翅膀一样,那些拥有实际文化资本的人比那些缺乏此类资本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博物馆的参观者^①。布迪厄发现,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两类所有者尽管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也有明显区别。“从经济资本和权力的角度看是统治阶层中最有特权的群体,而就文化资本而言,他们并不必然是最富有的。”经济精英很少致力于学术事业;最具文化资本者则是技能和学术上的精英,虽然他们也位居统治阶层,却仅为统治阶层中受支配的部分^②。布氏还发现,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几乎是完美的对应(homology)”^③,社会结构与行动者因习性迥异产生明显分层对应,而“习性(habitus)”系“一套普遍化的思想、观念、评价和行为规范”个人禀性^④,实为文化灌输和熏陶而成的性情(dispositions)使然。文化资本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习性,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有的译作“区隔”)。这种渐进渐变过程,对文化观念、象征或社会范畴的选择和应用,都依赖于行动者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故而,文化秩序中的变迁总会比社会层次上的位置和位置占领(position taking)落后一步,但最终还是与之和谐一致。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思想萌发过程中,社会学界有同类症候出现,与之呼应。例如,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其《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一书中指出,教育的“专利证书”(the patent of education)、文凭持有者企求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使得教育和考试的社会地位愈来愈显著,对一个人的发展而言,教育(通常简单地以就学年限的数量来表示)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他还提出“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对研究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现象以及加深对文化资本的理解认识启发很大^⑤。1983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范畴或流派的创造,如同小说的创作一样,是文学场域中资本分配及其营利的产物。1986年,布迪厄解析资本的三种基本类型,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即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建立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更基本的经济资本分配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所有的资本都是积累的劳动,不同资本形式的还原之链依赖于象征资本最终可自由转换为经济资本,而经济资本的分配通过创建一个有着象征区分的等级而在文化上结束^⑥。文化与资本的必然关系正体现在如下事实之中:文化的区分帮助再生产和表达经济资本的不平等。与马克思不同,布迪厄没有把资本认定为一个同时适应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机制,以使思想形式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形式相一致。布迪厄的主要原创思想是,存在非物质化的资本形式——文化的、象征的和社会的资本,正如存在物质或经济形式的资本一样,这些资本形式中的一种能够转换成另一种,只不过转换时的难易程度不同^⑦。

^①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Power*[M]// J. Karabel, A. H. Halsey.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24.

^② [美]伊万·撒列尼. 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M]//薛晓源,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50.

^③ Craig Calhoun, Edward Lipuma, Moishe Poston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36.

^④ Pierre Bourdieu, J. C.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7.

^⑤ [美]柯林斯. 文凭社会[M]. 刘慧珍,等,译. 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1998:3,49.

^⑥ Craig Calhoun, Edward LiPuma, Moishe Poston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52.

^⑦ Craig Calhoun, Edward Lipuma, Moishe Poston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71.

(二)阐发

对于“文化资本”内涵,学术界在理解和运用过程中,作出了些许阐释,也提出了不少不同的见解。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在任教授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从事文化研究时,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范式自然衔接起来。1982年,迪马乔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功》一文,运用文化资本理论来观察美国教育现象。1985年,迪马乔和同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约翰·摩尔(Jhon Moh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文化资本、教育程度与婚姻选择》一文,指出教育程度已经成为谋求职业的最基本的敲门砖,而等级文化参与对教育程度和婚姻选择具有直接影响,文化资本与阶级地位之间关系明显。尤其是对男孩子来说,文化资本的获得是进入中产阶级的提前社会化的一个因素。在婚姻方面,文化资本对地位较低的男性和地位较高的女性的影响最大。对于文化资本的积累,即高雅文化和先进(数字)技术的掌控,是青年改变先赋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这种学术认识,对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社会区隔关系理论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1987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又译泽兰尼或撒列尼)和澳大利亚弗林德大学社会学教授比尔·马丁(Bill Martin)著成《超越文化资本:走向一种符号支配的理论》一文,指出当下一些理论家开始关注和运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资本主义国家受教育程度高的那些人的权力。该文提到,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资本包含两个相似的价值:占用和支配。虽然占用和支配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但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占用”的价值似乎要胜过“支配”的价值。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支配的价值是主要的。虽然文化资本允许它的所有者“占用”文化生产场域的机制,但这是文化支配而不是狭义上的“剥削”,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是一种隐喻,是一种符号性把握的权力。塞勒尼认为,与此相对比,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W.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1920—1980)对文化资本的涵义赋予了不同的见解。后者强调,劳动是“依照一些文化要求或标准、一种规范”^①来实现的,因此这种必要的文化投资应被看作是文化资本。换言之,文化资本就是以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些文化资本持有者因持有批判话语的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破坏所有权威,形成一个不断力图超越现实社会的新阶级。

1987年,当代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出版《电视文化》一书,在“大众经济”一节中提到了“大众文化资本”的问题。他指出,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获得的并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意义与快感。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可以有多种表述,但它总是站在对抗统治力量的立场上。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利益产生和制约着文化产业,它可以很好地融合进电视文本的常规与话语中,但不能囊括文本的所有架构。要使文本受到那些因社会地位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疏离感的读者欢迎,文本就必须包括对立、分离和反意识形态的痕迹。文本要在范围广大的读者中流行,就必须在一个极具危险

^① Alvin W. Gouldner: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M]. New York : Seabury Press, 1979; 27.

性的支点上维持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众多对抗性力量之间的平衡^①。

1998年,伊万·塞勒尼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伊亚尔(Gil Eyal)等著成《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述说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并且娴熟地使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研究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突出了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不可忽视的先导作用^②。2000年,迁为耶鲁社会学主任的伊万·塞勒尼向工作室提交了题为《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析为沙俄效力的波罗的海德国人现象》的学术报告。塞勒尼运用1710年至二战爆发两个世纪期间波罗的海德语人群政治地位兴衰实例,阐释了文化资本范式的社会政治涵义。曾几何时,沙俄帝国西北边缘环波罗的海地区不是由沙皇直接任命的官员统治,而是交由本地占不足10%的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居民“自治”。不仅如此,这个在沙皇帝国只是极端少数民族,其贵族阶层中却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沙皇政府高级文官,他们充当政府的智囊,操控财政外交大权,被委派管理沙皇大部分领土,在整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彼得大帝执政延续到1917年革命,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几乎构成了沙俄全部高级官员的1/8、整个非俄籍高官中的1/3,波罗的海德语贵族长期“在沙皇帝国外交事业中取得并把持了一个主导性地位”^③。个中缘由竟是这些人熟识西方文化,与先进的西方关系密切,受教育程度高,拥有新教伦理精神,发展出一套比俄国人所能提供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方法,代表了一种比他们自身还要先进的文化,成为代表沙皇帝国发展前途的势力。但是,从19世纪后期起,俄国制定了现代法律体系,俄语成为学校和官场通用语言,公务员通识教育普遍化,特别是1870年德国统一使得波罗的海德语人群有“第五纵队”之嫌,自此他们的文化资本价值走向反面,政治优势越来越遭到削弱,社会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和疏离。1917年革命以后,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又被当地民族主义势力清算其历史上的“护主”罪过,从此成为被打压对象。通过推演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境遇的变迁,塞勒尼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提出三点修正:文化资本并不总是居于经济资本统辖之下,有的时候、有的环境中照样起到决定作用;文化资本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尽管体制是重要的,但国际形势和秩序对之认可也很重要;文化资本仰仗一时政权的庇护是脆弱的,要把“影响力”(influence)与“权力”(power)区分开来。塞勒尼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使用的“贱民”一语,喟叹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命运悲哀,他们通过其文化资本获取了为期不短的影响力,却从来没有得到权力。

19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简·茹普(Jan C. C. Rupp)和罗布·兰格(Rob de Lange)写成的《社会秩序、文化资本和公民权利》一文指出,布迪厄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关注各种资本,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对马克思首先提出以及后来韦伯提出的资本理论的非常重要的详尽阐释^④。各种资本的占有者是社会的主导阶级,他们通过物质的强制力和符号的强制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等级,而且他们还通过使社会流行的秩序被理解为自然而言的事来达到这一点,因为同样是主导阶级决定什么是知识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意义(meaning)和不

① [美]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M]//单世联.文化产业研究读本·西方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2—100.

② Gil Eyal, Iván Szelenyi.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M]. London: Verso, 1998.

③ [美]伊万·撒列尼.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M].//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6.

④ Jan C. C. Rupp. Social Order, Cultural Capital and Citizenship[J]. Sociology Review, 1989, 37(4): 668—705; 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04.

重要意义。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亚历克斯·摩尔(Alex Moore)敏感地意识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代表了马克思社会经济理论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和转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摩尔把文化资本理论与教学研究实践联系起来,用“文化主义”(culturism)^①立场来理解各种“教育”事业。他发现,特定的社会系统中的众多工具、结构和话语(discourse)都服务于提升社会中现有的特权的利益,并损害该社会中现有的弱势成员的利益。这种过程,或是通过移入媒体支持的常识性话语,或是通过官方谈话及政治上与社会上接受的权利与机会均等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符号性刻印,所以特别“无形”或“隐蔽”。学校教育尤其如此,即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与学校课程,由当权者制定出一套“专制”的文化规范与优先选择权,它凌驾于其他文化规范之上,并诱导文化接受者将自身的文化视为次等的文化,教师则是“转化型的知识分子”。后来,摩尔将他的研究所得和思想收获,写成《文化资本、符号暴力与专制》一文,提交给“布迪厄:遗产”国际研讨会^②。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一度将文化资本范式运用于文化社会学研究之中,他的代表作《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1993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本的存在方式和教化功能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借助“文化资本”的形成和语言的习得的视角,杰洛瑞提出,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社会群体表述的问题,而应理解为“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的分配问题,因为后者控制着人们读写能力的获取,决定了文化资本的“富有”和“贫穷”群体的不同经典观,其中包含着不同的教化立场^③。

1993年,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撰文《习性、场域和资本:历史特性的问题》^④,揭示了文化资本理论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联。他说,当布迪厄开始他的资本分析时,马克思似乎在其脑海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形式或混合的物化形式,当它在私有即排他的基础上被一些行动者或一群行动者所占有时,就使得他们能够占用以具体化或活劳动形式存在的社会能量,劳动时间则是普遍的等价物即所有等价物的测量方式和社会能量的储存器。布迪厄创造性地提出了非物质化的资本形式,对社会阶级关系许多细微差别作出说明,他的资本内涵与马克思的最根本差异在于,它们更注重世代合理传递而并非需要革命颠覆。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问世后,美国波士顿大学戴维·斯沃茨(David Swartz)教授几十年孜孜于其阐发,形成了1997年出版的《文化与权力》和2004年出版的《布迪厄之后》等著述。斯沃茨说,布迪厄理论的核心,触及到马克思以降西方社会学的要害问题,即文化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迪厄尝试通过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是还原论的文化阐释,力图找到超越经典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极对立的中间道路。布迪厄把文化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

^① Alex Moore. Teaching Multicultured Students: Culturism and Anti-Culturism in School Classrooms[M]. London: Falmer Press, 1999.

^② [英]亚历克斯·摩尔.文化资本、符号暴力与专制[M]//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7-295.

^③ [美]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M].江宁康,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9-320.

^④ Craig Calhoun, Edward Lipuma, Moishe Poston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9-94.

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从而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了文化领域,把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加以重新理论化。

(三)广播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亦即大卫·索罗斯比)是在艺术经济学领域阐释与运用文化资本比较深入的学者。1998年,思罗斯比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文化经济学会上演讲说,经济学家传统地将资本分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则是第四种形式的资本,这意味着文化资本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思罗斯比主张,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产,它除了拥有经济价值外,主要还在于它内含、贮藏或提供文化价值。同其他种类的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有存量(stocks)和流量(flows)之分。而且文化资本以两种形态存在。第一种是有形的(tangible),以建筑物、位置、场所、艺术品等形式存在。第二种是无形的(intangible),它是一种心智资本,以群体共有的观念、习惯、信仰及价值的形式存在^①。两种文化资本都有可以测量的文化价值。

1999年6月,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行为经济学促进会(SABE)召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流学术研讨会,提出了文化资本与发展的特殊议题,可以看出文化资本范式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越来越大。而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捕捉到了文化资本这一新的学术范式,并逐渐在中国学界加以使用。

1994年第5期《国外社会学》刊载了英文版的《区隔: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亦即《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②)导言的中译稿。《国外社会学》1995年第4期刊登了比尔·马丁等所著《超越文化资本:迈向符号支配理论》一文,论述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新阶级理论以及布氏理论的新发展。同期还有罗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的《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中译稿一文,阐释了布氏经典著作《国家精英》的思想。

1995年《读书》杂志第6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燕谷题为《文化资本》的文章,简要介绍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涵义,并把布迪厄文化资本三种形态译为“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文化体制(cultural institution)”^③。

1997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编译了有关布迪厄(文中称“布尔迪厄”)的访谈录,冠名《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此书成为国内比较全面了解文化资本理论最早的著述。书中介绍布迪厄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形象认识,即文化权力的争夺是一个社会积累的过程,正如炼金术士一样,不断陶冶和筛选,寻找“仙丹”——知识分子的文化积累,得到社会体制确认即为文化资本。知识分子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因此,一般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这个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的矛盾位置,解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常有模棱两可的社会立场,它与平衡这个岌岌可危立场的企图相联系。尽管知识分子反抗那些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

^① [澳]戴维·索罗斯比.文化经济学[M].张维伦,等,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出版社 2003:56-57.

^②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③ 陈燕谷.文化资本[J].读书,1995(6):136.

序,在所有出现危机的时刻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因为在危机中他们独特的资本以及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真正受到了威胁^①。

1998年,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上发表《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一文,展示了布迪厄的学术图景,分析了场域理论与习性理论,解释了文化资本的思想维度^②。

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万俊人在《学习与探索》第1期上发表《文化资本与管理伦理》一文,分析阐释了“文化资本”这一新理念,探究了现代管理哲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增生的社会现象,进而提出建立管理伦理的课题^③。

1999年5月,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程恩富在其《文化经济学通论》一书中,论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其中谈到,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和可利用的各种资源是为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大部分是无形的,即使对它的开发和利用必须通过一定的物的形式来表现,但它所表现的不是物质形式本身,而是体现在其中的思想、观念、情感中。而且,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潜力是无限的,随着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可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资源也将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智慧也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资源^④。

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李煜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上发表《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一文指出,文化资本主要指社会上层文化方式或高雅文化。文章说,学者们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布迪厄关于阶级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引发的,布氏理论揭示了社会的分化基本可以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维度考察,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下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和分布状况相关。所谓文化资本,就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high status culture*)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由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是由社会上层所制定和把持的,所以那些能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风格、品味偏好、行为习惯、消费模式乃至整个上层的文化,往往就被赋予雍容华贵、高雅经典等标签。比如,在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文化就是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它们又被称为高雅文化,文化资本与阶级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资本是上层阶级的文化,作为上层阶级的象征,它起着标识阶级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又起着增强阶级成员相互认同和团结的作用。李煜还举例介绍说,学术界进一步深入讨论文化资本的作用机理,发现了文化资本影响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取得的具体缘由。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保罗·迪马乔和约翰·默尔结合林南(Nan Lin)等学者的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理论,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提出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即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又如,北美学者B. H. 埃里克森(B. H. Erickson)提出了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他认为,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资本题中应有之意,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来说,文化多样性立意在把文化资本看成领域、内容和主题多样化,地位、作用和功能均等化前提上,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文化资源的广泛性、有效性。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待社会网络资本积聚作用机理时,前者强调高层文化资本的阶级识别功能,后者则凸显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效用。因此,文化资本可以从两个维度测量:一是对社会上层文化的了解和

^①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79.

^② 王岳川. 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J]. 教学与研究, 1998(2): 39—45.

^③ 万俊人. 文化资本与管理伦理[J]. 学习与探索, 1999(1): 62—68.

^④ 程恩富. 文化经济学通论[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37—39.